



讲述、阅读、书写文字与世界

作者:伊丽莎白·塞尔克拉 (Elizabet Cerqueira), 发表于ROOTS

2025/10/29

“萨莫拉·马谢尔国际主义旅”(Samora Machel Internationalist Brigade)与赞比亚社会党(Socialist Party of Zambia)合作发起了赞比亚的“扫盲与生态农业运动”(The Literacy and Agroecology Campaign)。该运动源自一种信念:仅仅教人识字是不够的,人们必须学会阅读和书写这个世界。赞比亚位于非洲南部,是一个内陆国家,地势崎岖,野生动物资源丰富,拥有众多公园与狩猎区。[1]

赞比亚的语言多样性极高,当地人使用的语言和方言总共有70多种,大多数属于班图语系。[2]其中,有7种被认定为区域官方语言:本巴语(Bemba)、尼扬贾语(Nyanja)、汤加语(Tonga)、洛齐语(Lozi)、伦达语(Lunda)、卢瓦莱语(Luvale)和卡翁德语(Kaonde)。这些语言被广泛应用



于日常交流、社区广播以及农村地区的小学教育中。**[2]** 赞比亚人民普遍具备多语言能力，他们能够在社区语言、省级语言以及英语(殖民时期的遗留语言)之间自由切换。

尽管赞比亚本土语言种类繁多，但对于英语普及的重视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时期。那时，英语被强行作为行政管理和控制的工具，逐渐成为社会地位与获取权力的象征。独立之后，英语依然是该国的官方语言，并充当正规教育中的教学媒介。熟练掌握英语是就业、官方文件处理及全国性考试的必要条件。这使得英语文盲现象不仅是语言上的障碍，更成为了一种政治与社会壁垒，使相当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发展的权利。

目前，赞比亚有超过一半(**55.3%**)的人口无法用英语读写，其中大多数是农村妇女。**[3]** 性别与代际的不平等在赞比亚的教育现状中尤为突出。**2018**年赞比亚人口与健康调查(ZDHS)显示，**15**至**49**岁的女性中只有**48%**完成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，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**58%**。这一差距反映出赞比亚女性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仍受到历史、文化与经济等多重障碍的限制。**[4]** 因此，保障这些群体的基本权利，如受教育权及基本公共服务(医疗、交通、政府项目等)的获得权成为了当下的迫切需求。赞比亚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公立教育体系。学生在完成由国家资助的小学阶段基础教育(**6**或**7**年级)后，继续求学需支付各类费用，这令许多家庭难以承担，迫使大量学生中途辍学。除此之外，基础设施匮乏也造成各种不便，许多学校距离居民区较远，学生需要每天长途跋涉上学。

若结合性别分工来看，女性面临的现实会艰难得多。早婚早育、繁重的家务负担以及缺乏完成学业的经济来源，使得女性获得教育的机会更加受限。据统计，每个赞比亚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**5**至**6**个孩子。**[4]** 许多女性在成为母亲后被迫中断学业，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和家庭。在许多农村和偏远社区，女孩辍学去照顾弟弟妹妹、挑水、做家务或帮家人种田、卖菜，这些责任让她们几乎无法重新回到校园。与此同时，对年长者而言，教育缺失则源于另一重原因：他们成长的年代处于殖民教育体系之下，该体系要么将非洲人排除在学校之外，要么仅为他们提供体力劳动所需的基础培训。许多人在那种环境中长大，根深蒂固地认为“学习与自己无关”，直到今天，他们依然背负着这种被排斥的象征性负担。



在赞比亚西部省塞南加地区，扫盲课堂正在进行中。(来源：萨莫拉·马谢尔国际主义旅)

“扫盲与生态农业运动”正是对这种社会现状的直接回应。它不仅是一次教育行动，更是一场让人们重拾尊严与声音的社会运动。对女性而言，这是重新夺回被剥夺话语权的机会；对年长者而言，则是一个契机——使他们可以重新有尊严地理解文字与世界。英语这一单一语言的主导地位加剧了语言与地域的不平等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“扫盲与农业生态运动”致力于将地方语言视作为学习的起点，并明确：真正的扫盲不仅是认识英语文字，更是能够读懂世界、改变世界。

该运动受到古巴的“Yo, sí puedo”（“我能行”）成人扫盲法、保罗·弗莱雷 (Paulo Freire) 的人民教育理论以及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 (MST) 扫盲实践的启发，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了独特路径，被称为“讲述、阅读、书写文字与世界”。这种方法是在教育者与学习者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，扎根于赞比亚农村、城市与边缘社区的现实语境之中。

在农村地区，大多数学生本身就是农民——他们的双手布满田间劳作的印记。因此，扫盲与生态农业培训具有双重价值：学习读写不仅意味着识字，更意味着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，并改善生产与生活条件。在城市地区，许多学员生活在社会边缘，有的失业，有的从事小商贩工作，有的居住在简陋的棚屋中。学员的现实背景极为复杂多样。除了学习读写的愿望，他们还带着迫切的生活问题进入课堂。因此，在字母与笔记本之外，课堂也成为探讨食物、健康、水源、住房与尊严的空间。

这场运动的目标远不止教授读与写，而是要让赞比亚成为一个“无文盲国”，培养具有批判意识、自觉性与组织能力的公民，让他们能够共同解读世界并改造世界。该运动完全免费。这是其核心



原则之一——教育被视为一种人人享有的权利，而不是特权。在一个许多家庭每日生活费不足两美元的国家，免费教育确保任何人都不会因学费、教材费或交通费而被排除在学习之外。在部分社区中，组织者甚至为教师分发了自行车，以便他们能顺利前往偏远地区的课堂。

该运动计划覆盖整个赞比亚，优先关注文盲率最高的地区，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。从2021年至今，已有超过5000名学生通过该运动学会了阅读与书写，打破了文盲的循环。在第一阶段，约2130名学员在东部省与西部省的农村地区参加课程；第二阶段则扩大到卢萨卡省、铜带省与中部省的城市地区。



在卢萨卡省的课堂上，学员们正在认真完成作业。（来源：萨莫拉·马谢尔国际主义旅）

该运动的教育者与地方协调员均为志愿者。他们的任务包括在社区内动员学员、识别潜在学生，并与传统领袖、教会及党组织合作，设立教学场所。教育者在进入社区之前，会接受系统的政治与教学培训，深入学习“讲述、阅读、书写文字与世界”的方法，以及保罗·弗莱雷的思想遗产。培训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讨人民教育的意义。教育者被训练如何根据不同地区（农村、城市或边缘社区）的具体情况调整教学内容与方式。这种方法倡导一种积极、对话式的教学：扫盲过程从学员自身的生活经验与语言出发，通过他们提出的词汇与主题，引导其学习和反思。这些词汇体现出他们的劳动、愿望与社区所面临的问题。正如保罗·弗莱雷倡导的那样，从人民的词汇出发，才能唤醒批判意识与对于变革的渴望。



赞比亚东部省钱塞富地区，一名学员在学习字母后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(来源：萨莫拉·马谢尔国际主旅)

该运动所使用的教学材料包括识字练习册、教师手册和生态农业实践指南。每节课都将阅读、书写与日常生活主题结合在一起，如健康、营养、住房、环境与社区组织。由此，扫盲不再只是对字母的技术性解码，而是一种解放的实践，一种重组集体生活的方式。

但基础条件的匮乏仍是一个巨大挑战：如何到达最偏远的地区、如何保障教学材料与交通、如何筹集维持教学活动的资金——这些问题始终存在。尽管如此，团队始终坚持一个信念：扫盲是一种解放性的行动。



卢萨卡省卡巴纳纳区，学员们手持学习资料合影。(来源：萨莫拉·马谢尔国际主义旅)

生态农业教育

与识字教育并行的，是关于土地的学习。生态农业并非附属活动，而是整个教育过程的结构性组成部分。它将文字学习与粮食种植、种子保护、社区记忆和体面生活的权利结合起来。2019年的《赞比亚土地治理报告》指出，从土地分类来看，15% 至 20% 的土地处于合法所有权之下，而 80% 的土地仍受传统习俗所有权管理。[5]该国超半数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，深受资本主义带来的系统性社会问题影响。与此同时，气候变化对他们的生计产生了巨大冲击，气温波动与降雨模式的改变直接影响农业生产。

生态农业的教育理念体现在日常课堂活动和教学计划中，整个过程由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引导：

- 如何将生态农业的实践内容融入教师的教学计划？
- 生态农业团队如何参与教师培训？
- 在制定课程表时，如何结合当地的农业节奏，考虑播种季与旱季？

在各社区中，开展了多种生态农业实践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- 保护与记录药用植物的种类；
- 创作关于生物多样性与健康的社区壁画；



- 建设社区花园与苗圃，将其作为学习阅读、书写与计算的教学空间；
- 组织关于健康饮食与粮食主权的视频放映与讨论会。

在这些社区中，语言与实践紧密结合——书写与播种、浇灌、收获一样有意义。例如，当学员学习“土地”这一主题时，他们不仅学会阅读和书写相关词汇，也学会如何制作天然肥料，如“肥茶”（由动物粪便与当地有机物制成的生物肥料）——这种方法能够提高农作物产量，同时减少对化学肥料的依赖。

同样，在公共健康领域，学习读写的过程也与认识“超级食物”相关联——如花生、高粱、辣木和当地玉米等食材，这些食物能够有效对抗营养不良，增强身体的自然免疫力。课堂因此成为科学知识与传统知识相遇的空间：学习一个植物的名字，也意味着认知它的治愈功效；书写一道菜谱，也是在记录社区的集体记忆。

在这种教育理念下，扫盲与生态农业相辅相成，不仅培养人们对文字的理解，也培养他们与土地、社区和谐共处的智慧。在这里，学习是一种反抗的行动，更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行动——因为能读懂世界的人，也能够改变世界。



赞比亚卡尼亚马选区进行的生态农业培训。（来源：萨莫拉·马谢尔国际主义旅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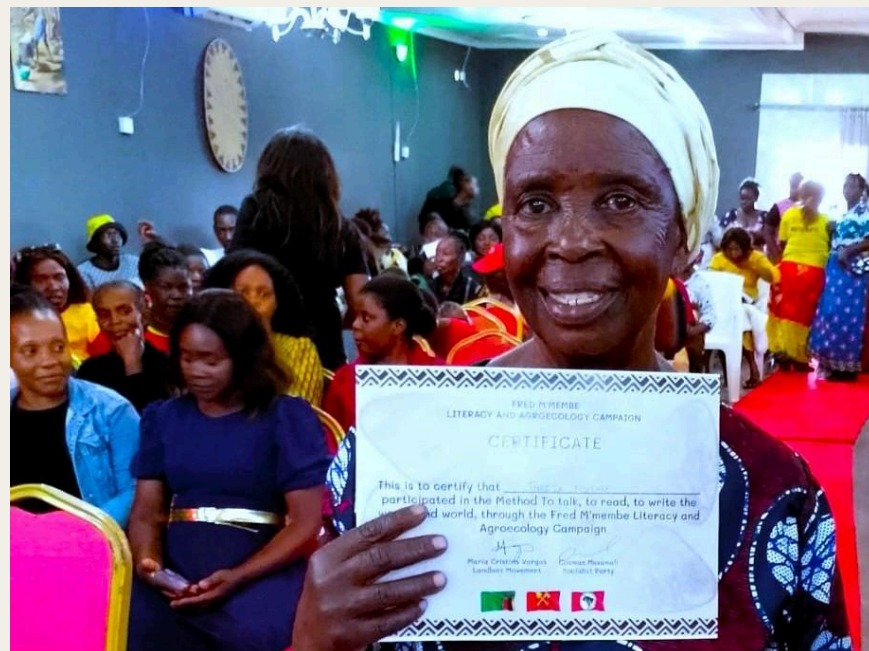
非洲解放的活种子



在赞比亚，这场扫盲运动是一种解放的行动，是人民知识与政治知识、文字与生命之间的对话过程。它成为一个巨大的聚会场所，在这里，人们交谈、提问、倾听、思考，共同编织出一个民族的未来——一个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书写自身历史的人民的集体愿景。这场运动不仅是一个教育项目，更是一种组织与希望的实践。每一次阅读圈的讨论、每一堂露天课、每一个新学到的词汇，都是一颗人民力量的种子。它加强了社区的反思、计划与自我决策能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们逐渐意识到：赞比亚的未来可以从下而上地建立起来，从人民脚下所踏的土地开始生长。

正如阿米尔卡·卡布拉尔 (Amílcar Cabral) 致信保罗·弗莱雷所说，教育必须从人民的内心深处生长出来，将被殖民夺走的尊严归还给农民。同样，在赞比亚，这场运动也成为一颗种子——在村庄与社区中，识字的行为化为一种坚定的抗争：赞比亚的未来，只有扎根于本国的历史、文化与自我创造的能力，才能真正开花结果。

因此，这一方法被称为“讲述、阅读、书写文字与世界”，因为在这里，“讲述”意味着理想，“书写”意味着耕耘，而“阅读”意味着解放。这是一条延续与致敬之路，延续了卡布拉尔、弗莱雷以及无数非洲人民的斗争——自始至终，他们都深知，文字就像种子，唯有落入肥沃的土地，才能生根发芽。



在卢萨卡省毕业典礼上，学员特蕾莎·布瓦利亚 (Theresa Bwalya) 微笑地站在台上。(来源：萨莫拉·马谢尔国际主义旅)



在这段旅程中，有两封信深深触动了我，也成为我坚持的力量源泉。一封来自一位年长女性那双布满皱纹与老茧的手——她通过简单的文字重新发现了与世界沟通的力量；另一封来自一位年轻的白化病女性——她曾长期承受社会的排斥与歧视，如今第一次用坚定的笔迹写下自己的名字，仿佛发现了“书写”也可以是一面镜子。

这两封信让我想起了阿米尔卡·卡布拉尔与保罗·弗莱雷之间的通信——两位来自不同世界的思想者，却有着共同的信念：人类有能力思考、创造并改造自己的历史。卡布拉尔曾写道：“没有人能解放别人，也没有人能独自解放自己，人们只能在共同体中实现自我解放。”多年后，弗莱雷补充说：“教育并非传递知识，而是为知识的产生与构建创造可能”，这正是我们在此处践行的理念——共同体精神。扫盲由此成为一种饱含爱与勇气的行动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朴素、最持续的抗争方式。



Theresa Bwalya, 67, Lusaka (Chilenje)

Dear Educators and Fellow Campaign Members,

My name is Theresa Bwalya. I am 67 years old and I want to write this letter to tell you what has changed in my life since I started studying. For many years, I lived with a silent sadness: my grandchildren spoke English, and I couldn't talk to them. When they came to visit me, I just smiled, but I didn't understand everything they said. Sometimes I felt ashamed. When I turned on the television, the words ran fast, and I had to ask someone to translate what they were saying. It was also difficult to use the phone. I would look at that device and it seemed like a closed world to me. I always needed someone to open messages or make calls for me. Today is different. Now I can read and write. I can understand what they say on TV, respond to messages on my phone, and talk to my grandchildren without fear. Every new word I learn is like opening a window. Even though I am elderly, I feel that literacy has given me back my youthful mind. I can no longer work hard, but I can manage my small shop, calculate profits and expenses, and take better care of my life. I feel happy because knowledge is like the light of dawn: it comes slowly, but when it spreads, it illuminates everything.

With love and gratitude,
Theresa Bwalya



多萝西·穆松达，25岁，卢萨卡市（奇帕塔拓展区）



亲爱的教育工作者们：

我叫多萝西·穆松达，今年25岁，住在卢萨卡市奇帕塔拓展区的社区。我怀着满心感激写下这封信。

我和双胞胎兄弟一同出生，我们俩都有相同的视力障碍。我来自一个8口之家——3个兄弟和5个姐妹。我的父亲已去世，如今我与1位姐妹同住，她也是单亲妈妈。从小，我常听人说我不能上学。在许多学校，老师都建议我去恩多拉的一所特殊学校，因为“普通教室里没有我的位置”。这些话让我感到很痛心，也让我觉得自己仿佛不被完整地看待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觉得自己像是隐形的。

然而，当我遇到“扫盲与生态农业运动”时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有人第一次对我说：“你可以学习，而学习是一项人人享有的权利。”

如今，我怀着喜悦阅读和写作，学习关于土地、生活以及自我的知识。我明白了，知识不仅属于用眼睛看的人，也属于用心去感受的人。

我由衷地感谢所有相信我、耐心且充满温情地教导我的人。教育给了我希望、力量和未来。

怀着爱与感激，
多萝西·穆松达

参考文献

[1] Carwardine, M. (1988).《赞比亚的自然:保护与发展指南(第2号)》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(IUCN)。

https://books.google.com.gh/books?hl=en&lr=&id=bzwTeSDBJmIC&oi=fnd&pg=PA8&dq=Zambia+is+a+landlocked+country+of+rugged+terrain+and+diverse+wildlife,+with+many+parks+and+safari+areas.&ots=MBk3DHoPH2&sig=Dy1VVxM7GYQAQlYXrDFNvBGNSho&redir_esc=y#v=onepage&q&f=false

[2] 《赞比亚语言与文化:其丰富遗产一瞥》。 [Zambia Language and Culture: A Glimpse into Its Rich Heritage](#)



[3] 中央统计局(赞比亚)。(2003)。《月刊——2003年10月》(第7卷)。卢萨卡:赞比亚共和国。 [Microsoft Word - Vol 7 2003 The Monthly October.doc](#)

[4] 《2018年赞比亚人口与健康调查》。

https://www.zamstats.gov.zm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12/2018-ZDHS-Key-Indicator-Report.pdf?utm_source=chatgpt.com

[5] Chingala, S. (2019)。《赞比亚的土地治理》。发表于国际土地管理与土地使用权研讨会, 纳米比亚科技大学, 温得和克, 纳米比亚。

<http://landsymposium.nust.na/sites/default/files/2019-08/Land%20Governance%20in%20Zambia%203-4%20September%202019.pdf>
